

HEZHONGHUA
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和钟华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纳西学丛书

和钟华◇著

民族出版社

纳西学丛书

白庚胜 和自兴◇主编
和钟华◇著

HEZHONGHUANAXIXUEJUNJI

纳西学论集



和钟华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和钟华纳西学论集/和钟华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7. 5

(纳西学丛书/白庚胜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08296 - 4

I. 和… II. 和… III. 纳西族—民族文化—文集
IV. K285.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3428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mzchs.com>

北京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3.125 字数: 338 千字

印数: 0001 - 2000 册 定价: 3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8296 - 4/C · 215 (汉 194)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 (010)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 (010) 64224782



作者简介

和钟华，从金沙江大峡谷走出来的纳西族女学者。大学毕业后从事过高等教育、学报编辑等工作。之后从事以纳西族为主的民族文学、民族文化、民族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以及民族社区发展项目的实践与研究。曾担任过研究室主任、副所长等职务以及若干社会职务。曾先后应邀赴美国、加拿大、泰国、菲律宾、印度、不丹等国进行学术考察。出版过专著6部，编撰学术著作10部，发表论文70余篇、100余万字，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7项，被云南省授予“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老专家称号”。

致力于纳西学的崛起（代序）

白庚胜

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一位朋友在看到我的
小文《纳西学发凡》后，决定将它投稿于该所一本相关专业杂
志发表。谁知该杂志的一位“权威”竟说什么“纳西学何有
之？”听到这一信息反馈，我心怅然，既忿然于这位权威的傲
慢，同时也感慨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迟滞。

感愤之余，我并没有停止思考与行动。在从中国社会科学院
调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及分党组书记后，我利用工
作之余穿行于首都北京与全国各地，尤其是昆明、丽江、迪庆等
地纳西学学者及纳西族官员、实业家之间，决定组织一套纳西学
丛书。在我的设计中，这套丛书包括 30 部国内外较有影响的纳
西学学者的学术专集。

正如广大读者将从这套丛书中了解到的那样，纳西学的发展
历程艰难备至。它的起步一般可以锁定在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初。那时的纳西学以西方学者、传教士、军事人员
游历纳西族地区，并收藏东巴经典，翻译有关文献片断，发表有
关介绍文章为主要特点；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末，纳西
学粗具规模，刘半农、董卓宾、李霖灿、陶云逵、罗常培等内地
学者开始关注纳西族历史、语言、文字研究，纳西族学者杨仲
鸿、方国瑜、赵银棠亦接踵于后进行多领域的探索，无论是其田

野调查、文物收藏，还是专题性的研究都成果迭出。在国外学者中，被誉为“西方纳西学之父”的洛克以独居纳西族地区 28 年的传奇经历，以丰富的纳西文物收藏与传播，以深刻而全面的纳西文化诠释在纳西学领域渐入佳境；从新中国成立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洛克在国际纳西学界独领风骚，并影响育成了欧、美、日等国的一批纳西学新秀。这一时期，与之失去联系的我国纳西学界仍在踽踽前行，和志武、周汝诚、和发源等先生成为传递薪火的骨干力量；6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尽管仍有雅纳特、杰克逊等活跃于学界，但一代宗师洛克的去世使西方纳西学跌入低谷，国内的纳西学更是遭受浩劫，纳西文化生态遭受全面破坏，这是纳西学的全球性低迷时期；从 80 年代初至 21 世纪初年，纳西学进入全面复兴时期，《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的翻译出版、国际纳西学学会的成立、国际东巴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的举办等盛事都集中出现于这一时期。

对纳西学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问这一问题，我已在《纳西学发凡》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纳西学，就是以纳西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实践上，它贯穿古今；在空间上，它横跨东西。它既包括对纳西族的本体性研究，也包含这种研究本身。就前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的生存环境、存在历史、生活方式、精神信仰、组织制度、艺术创造、技术成就等都无不纳入其视野之中；就后者而言，有关纳西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学者与成果、历史与活动、机构与组织都囊括于其内。”对于这一判断，我至今认为比较科学、正确，它同时也被学术界所接受。因此，编纂这套纳西学丛书的冲动之一，就是为了进一步为纳西学立名、正名，并全面、系统展示纳西学的内涵。当然，这只是就至今为止的情况而言，继续丰富、发展它的使命已经历史地落在后来学者的肩上。

当这套丛书即将问世之际，纳西族社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

史时期。一方面，固守万古的民族保守性已经被击破，发达的交通已突破铁甲山的阻绝、金沙江的割断，使“丽江口袋底”的神话不再；快捷的通讯将古麼些人的后裔编织进全球现代信息网络之中，靠古老的象形文字及口传心授维持独立的知识系统已难以为继；农民转变为市民、乡村开发成城市的社会转型风驰电掣；以追求超额利润为目的的一库八站建设将一改玉壁金川的原生形态；每年400万的游客正在改变着丽江的一切；不断变化的行政区划，使纳西族的生存空间从汉时的六江流域退居三江并流区，继而兰州立县、拖支并维、迪怒建州、行署改市、丽江县裂身为二。从自然到社会分错杂然，到处都在发生急剧变化；由社会而主体光怪陆离，一切都在解构与重组。这便是纳西学今天所面对的现实，这也是纳西学学科的生长点。或许过于苛刻，但纳西学必须回答纳西文化生死存亡的问题，决不能陶醉于古乐、古城、古文字带来的荣耀，更不能沉迷于现代社会的犬马声色、“安乐死亡”。

纳西族社会的阵痛或许正是纳西学的荣幸。阵痛，所以产生刺激，有了问题意识；阵痛，所以有新的思想诞生，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已经走过的历史岁月，纳西学已经产生《麼些研究》、《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英语—纳西语百科辞典》、《被遗忘的王国》、《纳西族象形文字谱》、《活着的象形文字》、《纳西族史》、《纳西族文学史》、《麼些研究论文集》、《东巴神话研究》等标志性成果，产生了巴克、洛克、雅纳特、西田龙雄、方国瑜、李霖灿、和志武、郭大烈等大家，涌现出戈阿干、杨世光、和钟华、李国文、王元鹿、詹承绪、王承权、刘龙初、喻遂生、杨焕典、伊藤清司、王超鹰、蔡华、杨福泉、和少英、拉木·嘎吐萨、李近春、白西林、杨德鋈、余嘉华、諏访哲郎、和发原、木丽春、杨正文、李静生、王世英、李锡、李海伦、杨海涛、陈

烈、赵心愚、白郎、和力民、习煜华、李丽芬、和宝林、和庆元、和品正、牛耕勤、周智生、冯莉、孟彻理、生明庆二、黑泽直道、杨杰宏等学者，成立了国际纳西学学会这样的组织，创办了《国际纳西学学会通讯》这样的杂志，出版了《纳西东巴古籍译著全集》这样的经典，举办了国际纳西文化艺术学术研讨会这样的会议。我们也可以由此坚信：未来的纳西学将在更广的学术视野、更细的专业分工、更大的学科综合、更细的理论分析、更多的民族与国家参与、更先进的科技手段利用之基础上得到发展、得到推进，并产生新的学术成果，推出新的学术代表人物，创造新的学术辉煌。

学术需要积累，学科也需要积累。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骄狂自大，且让我们都来做纳西学的积累工作。纳西学的存在证明只能是实力：实实在在的队伍，实实在在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资料，实实在在的工作。

按照丽江市市委书记和自兴同志与我确定的原则，这套纳西学丛书就其作者而言，不分中外，不别纳汉，凡在纳西文化研究中作出突出成就者均列在入选行列；就其范围来说，除文学创作以外的纳西学论文、评论、调查报告、译文都择优辑入；就其目的来说，完全是为了对纳西文化研究进行梳理，结构纳西学的框架，提炼纳西学的方法，唤醒纳西学学科建设的自觉，确立纳西学的主体。

组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显然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尤其需要纳西族学术界的参与。有幸的是，我的初衷得到了同仁们的响应，更得到丽江市古城管理局及其局长和士勇的襄助。最难忘的是得到民族出版社及其罗焰女士的帮助，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旅游文化专业委员会刘永生秘书长、李莉副秘书长和苏州市蔡琨先生、庞欢先生的慷慨扶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又一次得到证明。

我坚信，总有一天，纳西学必将成为与藏学、蒙古学等学科并驾齐驱的显学，我的后继者将不必再为“权威们”怀疑纳西学的存在而饱受屈辱。到那一天，纳西学将不再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的文字、训诂、语言、文学、哲学、历史、地理、宗教、军事、辞书、艺术、社会、医药、天文、技术、生态、民俗等分支学科都将一一形成，并向更深入、更细致的层次发展。

2006年5月13日

于北京寓所

前 言

我出生在一个地道的纳西族家庭——一个已经衰落的书香门第，父辈是几个各奔前程的孤儿。我刚满周岁，就跟着母亲从出生地昆明回到了在金沙江边谋生的外婆身边，父亲则随堂伯父入滇军上了抗日前线。就这样，在外婆那流泻不完的故事中度过了我的童年。虽然没有像丽江古城中殷实人家子女那样上幼稚园接受学前汉文化教育的条件和机会，我却有着接受浓郁的纳西族传统文化启蒙和接触汉民族语言文化的机会：我童年时代生活的长江第一弯畔的石鼓小镇，是纳汉杂居的农村小镇，镇上汉人居多，杂以从丽江迁来的少数纳西人；邻镇的四乡则主要系纳西农民。沿金沙江而上，则纳西、汉族村寨交错而居，这是古时中原王朝在纳西地区戍边的结果。因此，长期以来，这一带地方纳汉文化并存，语言服饰（汉人亦着纳西服）相通。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我自幼就有机会接受到“双语教育”。当然，这是不自觉的，然而它使我受用终身。因我家是纳西族，交往最多的是从丽江迁移而来的纳西族老乡。在家中自不必说，在外平时交往频繁的也多系纳西人（大凡节庆、婚丧大事，老乡们都要在一起，显现出一种顽强的内聚力）。所以，就深层来讲，我受纳西文化的濡染更多。小学高年级及中学，我又在丽江古城这一纳西文化圈

中生活，受纳西文化影响更多、更浓。唯其如此，纳西血脉、纳西根骨，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身上。对纳西，我有着血浓于水的情感。我执著地热爱我的民族、热爱我的民族的文化，立志为它奉献我的一生。

我成长的年代，是“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年代。在大学毕业后，我回不到故乡，干着非我所愿的工作。直到不惑之年，我才圆了梦——回到云南，干我喜欢的民族文学研究工作（以研究本民族为主）。尽管岁月蹉跎，但我并不甘心，我要把失去的时光争回来。就这样，我如痴如迷地遨游在民族文学的海洋里。一晃十年，与编写组的同仁们一道，完成了《纳西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我有了更多的机会深入到不同的纳西族聚居地区，了解当地的生产、生活、习俗、宗教、文学、艺术等等，使我大开眼界。有时，为找到一点点线索，需要来回跑许多崎岖的山路，但只要有点收获，我都会兴奋无比，疲劳顿消。记得到中甸白地调查，当时未通公路，只有一条简易的林区运输便道。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只身一人搭乘公安局公干的一辆吉普车。那时正值雨季，天上下着滂沱大雨，地下却是到处坍塌滑坡的毛路，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很多时候找不到路。坐在车里，有时头撞着顶篷，有时又双脚悬空，身体仰前甩后，七八十公里的路程，走了整整八个小时。第二天起来，整个身子像散了架，疼痛不已。然而，我在这里却找到了丰富的资料，得到了乡亲们的厚爱。特别是老东巴加高吉若，把我当成自己的女儿，倾其所知，毫无保留地教给我；老歌手和义财给我演唱了他所掌握的所有传统调子，使我终生难以忘怀。虽然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虽然每天都得爬山下坎，但每当夜晚整理资料时，那种激动的心情，使我沉入幸福之中。到宁蒗拉伯，我与同伴是挤上一辆塞满了回家过年的乡亲的救护车去的，人只能侧着身子像楔子一样夹进去，因为同样是林区运木料的便道。夜里睡在伐木工

人的工棚里，木头当枕、木板为垫，外面是飘飘雪花和麂子的叫声，棚内四壁透风，使我想起了温暖的火塘。就在那次，我听到了最优美的催眠曲和饶富情趣的纳西族摩梭汉子的传说故事。过江时望着滔滔而去的金沙江水，又回到了我的童年，我俯身捧起金沙江水，向着昆明方向，洒水祭奠母亲：“妈妈，我又回到了江边，我又喝到了金沙江水！”——《纳西族文学史》就是这样倾注着我对自己民族、故乡、亲人的爱！本集子中关于文学（含民间和文人）的几篇文章，就是当时（1983年—1993年）写的。这也是我步入民族文学研究之列的收获和足印之一。

由民族文学到民族文化，这是我拓宽研究领域的一步。严格说来，民族文学属于民族文化范畴，二者密不可分，只是点和面的关系而已。这是我的理解。民族文学又包括民间文学、文人文学、文艺理论等，像纳西族还有介于民间和文人之间的东巴文学。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本身，就是集文学、历史、宗教、习俗等等于一炉的共生矿（纳西东巴文学亦如此），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为此，研究民间文学，实际上是研究民族民间文化。正如鱼离开了水，就将没有生命一样，研究民族民间文学，离不开民族文化的研究。除了民族民间文学以诗、歌、舞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而外，还有其演唱的场合、人群，有的还有仪式等，这都是民间文学生存的环境。如纳西族的民歌：婚俗歌、丧俗歌仅限于婚丧场合，爱情歌旧时只能在野外唱，而其内涵包括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内在价值。基于这样的体验和认识，在研究民族民间文学过程中，我自然而然地拓展到了民族文化的研究。本集子中的关于民族文化的几篇文章就是这样写就的。譬如在丽江、永宁、白地等不同纳西族地区的田野调查，当时为的是搜集编写文学史的资料，可一深入下去，就发现民间文学这一丰富的矿藏，竟是与民俗、宗教、伦理、哲学、历史等等共生的，而不同地区又有着共通和不同。这些多彩的文化现象，引发了我的思考，进而作

深入探究，写就于1986年的《纳西文化三类型》一文，就是这样探究的结晶，它也是我对纳西文化整体思考后得出的基本观点。又如，研究纳西族文学，离不开东巴文学，因为它是纳西族文学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东巴文学是介于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的一种宗教文学。它既流传于民间、有广泛的受众，又以书面的形式存在着，然而又有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和变异性。一般而言，它没有文人文学那样署有专门的作者和严格定格化的文本（同一文本因不同流传地区而有或多或少的差异）。更主要的，它是以宗教经文的形式出现的，宗教成分较浓。故，研究它离不开对东巴教本身的基本了解。《东巴教中的巫文化》一文，是我这一意图的粗浅探索，后因转向妇女研究，没能再深入下去。尽管班门弄斧，也算是一段经历吧。总之，从实践中，我深切体会到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不能截然分开，只是在研究中侧重点、视角的不同而已。

以上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概况。

在研究民族文化（含民间文学）的过程中，我发觉并深感妇女是个重要的角色：许多神话及传说故事以她们为主题；在现实生活中，她们是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创造者、传承者，然而往往被淹没于男性文化之中。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驱使着我去梳理、弄清这一问题，于是顺理成章地从民族文化深入到女性文化的研究领域。此一转折，是在80年代末。《东巴教的女性崇拜及其演变》一文，就是当时的产物。当时正值全国范围内妇女研究异军突起，然而偏处一隅的云南尚未波及，我是在无意中卷进这一领域的。与其他地区一些妇女研究先行者不同，我是在毫无相关理论准备的状况下自发地跨进这个门槛的。当然，就我由民族文化的研究延伸至民族女性文化的研究而言是自觉的。正因这样的背景，我在以后的女性研究中，总是离不开社会文化背景的视角。《在女神的天地里》、《以砚池命名的城——丽江古城寻踪》（其中

不乏女性的视角)两本小册子,就属于这种情况。

多年的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使我形成了一种性别敏感性,凡事都要用社会性别的眼光去观察、去审视。《茶马古道与纳西女人》、《纳西族社会性别观念的演变及其对妇女的影响》等文就是代表。在《茶马古道与纳西女人》一文中,我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茶马古道成就了那一时代纳西男人的辉煌,立于他们身旁或身后的女人们,也无逊于那一时代、那一群人,因为她们付出了一般人家妇女所难有的生活的、情感的代价。这是基于我调查所得的体验和认识。关于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在这里有必要对其作个简单介绍。何谓社会性别研究?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都统称为妇女研究,以后随着妇女研究中引入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遂成为当今妇女学界公认的研究范畴。社会性别,英文为Gender,非Sex,即指社会性别,而非生理性别。它指人在出生以后社会文化对男女两性的规范,即社会对两性及两性关系的期待、要求和评价。它是后天形成的,并非与生俱来。我的理解是将妇女研究置于具体的阶级、种族、历史、文化之中,其核心是关注两性不平等问题,争取营造两性和谐平等、共建美好未来的社会环境。这不仅仅是个方法问题,而且是一种理念。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后来的研究及社会调查中自觉地运用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论,同时加进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方法,使我受益匪浅。

摩梭母系文化研究,是我关于妇女/社会性别研究的主要课题。纳西族摩梭人以盛行走婚和母系家庭为核心的母系制而闻名于世,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以来,它即被外界所关注。特别是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一批民族学家的调查研究,把摩梭母系制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进入80年代以后,他们又在原基础上作了进一步调查,撰写出了相关的专著和调查资料丛刊。之后,有关摩梭母系制的论文、文学作品、电视纪录片等相

继问世，吸引了更多的人前往寻觅、探奇、调查、研究。于是，有的把它看成原始母系制残余或“活化石”，有的文艺作品甚至以“奇”来赢得观众和读者，见仁见智，摩梭母系制成成了一个谜。

作为本民族女性文化的研究者，我脑海中盘旋着许多问题，促动着我去探究、去寻找答案。从1987年开始至1999年，我用了12年时间进行实地调查、跟踪调查和补充调查。自己从在职在岗到退休（女性55岁的退休政策下）以后，一直不间断，并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有了新的发现和认识，从而形成了我的基本理论框架：摩梭母系制绝非原始意义上的母系制，而是存活于当今世界、为其特定的历史、生存环境、生存状况、思想观念等所决定的一种生存方式，是一种生存和文化的选择，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上普遍盛行的、男性中心的父系或父权制的文化模式。它曾经历了母系——父系——母系的演进程序。这种文化模式以其特有的组织形式、家庭结构、伦理规范、社会功能等发挥着自己的优势，顺应着社会的发展，创造出了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在漫长的岁月中，尚未形成足以与之抗衡的力量（包括物质的、精神的），因而显示出了它的顽强的生命力。无论是昔日的土司制度或当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都没能改变或摧毁它。而今，面对强大的、前所未有的外来文化及商品经济的冲击，它正以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伦理观念进行着新的调适和整合。那么，当社会物质生产力达到能聚集起足够的能量与传统文化相抗衡时，又将会如何呢？囿于我的水平，只能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作些预测，那就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出现多彩的文化现象，即以母系制为主，母系、父系并存于同一家庭、同一社会中。此一研究的成果反映在《生存和文化的选择——摩梭母系制及其现代变迁》这一专著及相应的一些论文及调查报告中。

还应提及的是，在摩梭母系文化研究过程中，攸延春和我提出了“文化隔层”问题，指出之所以在摩梭研究中出现这样那样不尽符实的结论或现象都与此有关。因为固有文化的濡染对一个人具有强大的力量，故研究者（包括观察者、文艺作品作者）在看待或研究一种与自己所熟悉的文化模式大异其趣的文化现象时，往往不自觉地用自己所熟悉的观念、情感和模式来加以框套和分析，于是就会得出在研究者看来是正确、却与存在不尽相符的结论。此问题应引起注意。在研究方法上，我也运用了多学科、多视角的立体研究方法。这也得益于我所从事过的文化、民族、社会等学科的研究及社区发展项目的实践。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著作和文章得到了摩梭同胞的普遍认可，我把它当成是对我最高的奖赏、最大的鼓励。

妇女/社会性别研究，较之文化研究其现实性和实践性很强。这就促使我又从相对纯学术性的研究进入实践性、现实性的研究。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在继续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花去了大部分精力和时间从事妇女与民族社区发展项目的调查研究与项目实践。除了客观因素外，从主观讲，在过去十来年的研究工作中有一个问题总是在困扰着我：作为学者，我从朴实的乡村农民中搜集到了许多资料，文章出来了，名利双收了，可他们得到了什么？为此，我内心非常负疚。我所能做到的只是付点误工补贴或在他们生病或有困难时送点药或钱，或把发现的问题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或把发现的人才向当地推荐而已。这起多大作用？而这些地方多系边远贫困山区啊！我们应该如何回报，如何为改变他们的现状尽点绵薄之力？这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所以，在有的国外慈善机构资助的扶贫发展项目邀我参加时，就像如鱼得水，我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虽然耽误了写专著，我却感到一种欣慰。同时，这也让我学到了更多知识，丰富了我的人生体验。本集的几个项目调查研究报告，就是这样产

生的。

国际纳西学学会会长白庚胜博士给了我出版纳西研究论文集的机会，让我可以梳理一下自己二十年来研究本民族文化的足迹和成果，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只是囿于自己的学识，文章水平不高，也深为惭愧。不过，无论怎么说，它们是我走过来的一段学术生命的轨迹，就算是我向我的故乡、我的民族的汇报吧！

作者

2005年11月于昆明